

赵超／著

中国古代文化漫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

出版社

赵
超／著

雪 泥 鸿 爪

中国古代文化漫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泥鸿爪：中国古代文化漫谈 / 赵超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457-1189-9

I. ①雪… II. ①赵… III. ①文化史-中国-古代-
文集 IV. ①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9815号

雪泥鸿爪：中国古代文化漫谈

著 者：赵 超

责任编辑：张继红

责任印制：李佳音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http://www.sjebbs.cn>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76千字

版 次：2015年9月 第1版

印 次：2015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7-1189-9

定 价：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治学(代序)

前两年,我的小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出版以后,呈送一册给杨泓先生。先生对我说:“今后再也没有人做这种学问了。”诚哉斯言。当前时世,走前儒考证之路恐怕是难以立身了。如今却承蒙《中国文物报》青眼,让我写写自己治学的体会,不胜惶恐。真的,不胜惶恐。一想到自己走的这条小路明知没有人会再走,却还去指给别人,就觉得有误人子弟之嫌。何况面对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要劝人皓首穷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大概谁也不会去听的。只是历来不善拂人美意,在这“学术界充斥空泛、虚假、浮躁之风”(据某报评论)的今天,《中国文物报》却能致力于介绍治学之道,实在令我感佩不已,不写太对不起人家。但是自己思量,念了几十年书,还是似通非通,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怎么敢谈治学呢?细想多年来埋首故纸旧物,爬了上百万字的格子,其中体会最深的,还是当年导师孙贯文先生再三叮嘱过的几句话,就便在这里写出来,既算是自己的一点体会,也是对先生的一点纪念。



清儒有言：“读天下书未遍，不可妄加雌黄。”孙先生常一字一顿地对我强调这句话。当然，读遍天下书这条件现在说来太高，当代信息爆炸，几人能读遍天下书呢？我们平常进的图书馆书库里，那书已几乎令人无法读遍了。而那些著名的大图书馆馆藏会吓死人。国外的图书馆不像国内，可以随便进入书库，给人的震慑就更大。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大英图书馆时，看到那铺天盖地的几层楼高的书架上满满的图书，真是有一种人都要被淹没了的感觉。按清儒之诫，今天的人大多该缄口不言了，可是偏偏还要说，而且是越说越敢说，妄加雌黄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我体会，孙先生是以此告诫我写文章、提观点要慎重，没有对要研究的问题全面了解之前，不要急着发议论，下结论。老一辈学者研究一个问题，往往要多年搜集资料，了解有关研究情况，反复考察，深思熟虑后才发言，寥寥几语，就能发聋振聩，成不移之说。与强不知以为知，以其昏昏，却欲使人昭昭之徒，高下岂止千里？说来惭愧，自己迫于生计，有时也是匆忙成文，掌握材料恐怕未必全面。实在对不起先生的谆谆教诲。

人民公仆焦裕禄常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孙先生借用过这句话来告诉我治学的道理。可见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古往今来，真心做学问的人，总会追求得到一些自己独特的见解，做出一点超越前人的成绩，对于别人的说法，也不会简单地全部沿用，而要通过自己的思索与评判。即使达不到，也不会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甚至抄人家的书，用人家的话。天下文章一大抄，下笔千言，空无一物的，有没有



味道,想来大家都体会得出。更何况抄袭已经是涉及学术道德的大事了呢?这句话还可以延伸到研究的选题上去。已经被人家嚼烂了的题目,除非能别出蹊径,有所创新,否则还是不要再炒为妙。

孙先生还说过:“不与别人争材料,抢热门,要会用旧材料作新文章。这就像厨师做菜,好厨师能把同样的原料做出上百种不同的菜来。不好的厨师就只能糟蹋材料。”我知道这是针对当时争新材料的风气而言,岂知而后此风越来越盛。靠把持新材料先声夺人,为争材料不择手段,借助传媒大肆炒作……层出不穷。考古文物界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但是往往热闹一时,过后就无人再问津了,有关研究究竟深入到什么程度?解决了多少问题?恐怕没有多少人再去注意。我自知不善争抢,孙先生的话,于我心有戚戚焉。至于对别人是否合适,不敢担保。

多年来,这几句话一直记忆犹新,甚至连孙先生当时说话的神情都历历在目。话虽简单,做起来却极难。自己也未能完全做到,只好“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后来悟到,先生就是在讲做学问只是一个“实”字,老实、真实、踏实。这就不仅是做学问,而是作人的真谛了。我总觉得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弥高弥坚之处。学问与人格人品是完全一致的。不像当今学界,有的人学问漂亮,人品却不那么漂亮,有的人学问不漂亮,人品更不漂亮,甚至公然谎话连篇,虚伪成性。可能是世界变了,学问已经成为谋生之工具,而非天下之公器了吧。

由此就又想到,这些话说给别人是否合适。“不



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得快。”我在中小学读书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马克思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在崎岖小路上不畏攀登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现在很少听到人说这句话了。白云苍狗,大约如今是大道入云端了。有专车可坐的,或者买得起奔驰、宝马的,可以直驱顶点。上小路去攀登的,也许只有专好这一口的登山运动员了。没有人再作笨学问,幸甚。至于学术,幸乎?抑不幸乎?“君其问诸水滨”。

原载《中国文物报》



目 录

关于治学（代序）	001
冠、帻、编发、扁髻与其他	001
《香谱》与古代焚香之风	011
古代文物中见到的古代冶铸	023
埋在地下的宇宙	
——汉画像石墓和壁画墓的布局	027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031
东汉肥致碑与方士的骗术	034
汉唐墓葬中的鬼怪形象及其他	041
汉代画像石与北朝造像	048
《相马经》与汉代人们眼中的骏马	054
共命鸟与比翼鸟	063
巴蜀汉碑及汉代儒学	070
汉代文字的演变及其书写类型	086
明尼波利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北朝造像	0100
从南京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壁画谈开去	105
《客使图》上的唐朝官员	116
用夏变夷	
——谈中国文化对唐代金银器形制变化的作用	120



色色龟兹录续	125
有关韩愈的两则墓志	130
五花散作云满身	
——看唐代考古文物中的马	136
“二十四孝”在何时形成	146
宝丰香山寺《大悲观音菩萨传碑》	159
妙善传说与观世音造像的演化	164
大肚能容	172
《孝子传》的两件日本古抄本	178
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古代简牍与石刻	186
漫步于石刻丛林	195
中国石刻学的奠基之作	
——介绍《语石》和《语石异同评》	201
从考古文物谈服饰文化和礼仪	210
厚积薄发，开风气之先	
——读张政烺先生的石刻论著	223
周绍良先生与唐代墓志的整理研究	230
我所认识的杜德桥	237
访英随感	245
后 记	254



冠、帻、编发、扁髻与其他

中国古代一直传说“周公制礼”。礼之由来，可谓久矣。比较古代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古代社会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的不同中，有一点特别明显，就是对“礼”的极度重视。中原汉族在很早以前就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礼仪制度一直与法律相伴，是维系社会形态的重要支柱。这种礼仪制度实际上是从商周乃至更早时期的生活习俗和社会组织形式中衍生出来的。所以，它与人们的生活结合得十分紧密。例如当时倍受重视的“冠礼”以及“及笄礼”，就是从古代原始部族中普遍存在的成人礼演变而来的。但是中国古代的“冠礼”与我们从民族学资料中看到的一般原始部族成人礼还有所不同。由于它已经不完全是原始社会的遗存，而罩上了阶级社会的浓彩，所以它不仅仅是标志成人而已。通过“冠”这种特殊的头衣，这种礼仪还表现出等级的差别与民族的特色。如：是否著冠，曾经被认为是华夏民族与四方蛮夷的一个重要区别。所以冠礼被放在礼仪制度中极其重要的位置。恰如《礼记·冠义》所言：“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

中国历来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也就是说，华夏族人从生下来开始，就没有剪过头发（受了刑罚的除外），让它一直长着。那么，如何处理这些头发，就成了一个包含着重大文化因素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各民族在处理头发的方式上往往都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头发的式样也就成了区分各民族的一种特征。古代华夏民族生存的区域周围，还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在描述与其他民族的区别时，首先注



意的就是如何处理头发。如孔子感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指的就是披散头发、不加梳理的异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是指南方的古越民族。《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嵩、昆明，编发。”“朝鲜王满……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汉魏时期对乌丸、鲜卑等东胡民族的描述是，“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这些四方蛮夷对头发的不同处理方式，成了区分各民族文化的最佳根据。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原汉族的“束发”。冠，应该就是与束发相配合的头衣了。

这里，我们注意到汉代对昆明国的描述，即“编发”。编发应该就是将头发梳成辫子。而后北方的一些民族，如女真，就一直以“编发”为特征，但是他们的编发，应该是吸收了乌丸、契丹等民族髡首的部分习俗，将头前部剃光，与原来昆明等地的“编发”有所不同了。

由此看来，古代中原华夏民族，或者说从汉代形成的汉族，成年男子应该是不“编发”的了。所以才有后来对鲜卑人的“索虏”之称，才有清代初年被迫梳辫子时的强烈反抗。因为汉代以来的汉族人普遍是“束发”即在头上梳成一个发髻的。汉代以前想必也是如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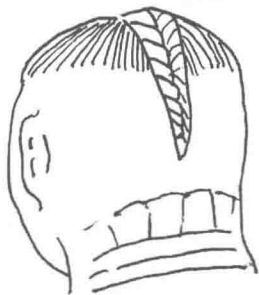


马家窑文化陶器纹饰

但是从出土文物中来看，我们却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在汉代以前，华夏民族曾经也有过编发的历史。所谓“束发”也是在编发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将发辫盘成发髻。想想这也很自然，一个成年人的头发，如果一直不修剪，一般应在三



尺以上，甚至四五尺长。要将这样多的头发束到头顶上，而且保持一定的形状，不会松散开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直接拢起来用头绳束紧它，在日常劳作中恐怕是很难保持住的，除了使用大量的簪、笄插上去加以固定外，只有先编成辫子后盘起才比较稳妥。但簪、笄等装饰品恐怕多是贵族老爷的专利。例如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了上百件各式簪、笄，应该是当时供妇好一人使用的。而同时期的平民墓葬中往往只有一两支簪、笄。限于条件，劳动阶层大概不会大量使用簪、笄，那么就只有编辫子比较便利了。编辫子的历史应该很早，人们在发明编绳索的前后，可能就会编辫子了。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古人编发形象，应该是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属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盆上。盆沿上描绘的舞人头上，都垂有编成的发辫。而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石人雕上，则可以看到更清晰的编发式样。如有一件玉人头上梳了一条长长的辫子，又把它盘到头顶，从头顶绕到左耳后侧，再缠到右耳后侧去。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人则将头发向上汇总，在头顶中心束住，梳了一条垂至后颈的短辫。说明当时编发的做法是很常见的。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发式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人发式

降至战国，表现编发的文物更多，如河北平山中山国王族墓中出土的银铜人灯、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铜人、故宫博物院所藏战国白玉人像等，特别是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中出土的大量陶俑，给我们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各种编发式样。秦始皇兵马俑在艺术上的高度写实性已经被大家所公认。它应该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士兵形象。发式也是如此。关于秦俑的发式，有过不少介绍与研究文章，如刘林《秦俑的发式与头饰》、林剑鸣《秦俑发式和阴阳五行》、王玉清《秦俑的髻髻》等。对秦俑的发式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并探讨了秦俑发式的内在含义。如王



玉清《秦俑的发髻》中将秦俑的发式分为辫状扁髻与圆锥髻两大类，扁髻类又分为2种5式，圆锥髻则从开始曲环的方向划分为6种18式。真是如沈从文先生所言：“编结之复杂到不可思议。”但是细观秦俑头上的发髻，基本上都是先编成发辫后再盘成髻的。



洛阳金村出土战国铜人发式

那么，为什么在汉代人的记载中，却不注重中原人也会编发的情况，把编发看成是中原人与四夷的一个重要区别呢？我们想，答案只能是：当时中原人的发式出现了变化，大多不再采用编发的方式了。

与商周至秦代那些繁缛的梳辫形式比较起来，不梳成辫子而结成扁髻的发式要简单方便得多，可能它使用得更广泛，特别是在汉代。就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文物实证，如陕西阳陵随葬的兵马俑、江苏徐州汉楚王陵陪葬的兵马俑等人物形象，基本上是把头发在头顶上中分，由两侧向后梳，然后反盘上来。由于大多陶俑在头顶上戴有冠巾，无法看到具体的发型，但是从它们头顶上没有高起的圆髻这一点来看，应该是梳成一个垂在脑后的扁髻的。他们没有秦始皇陵兵马俑那样繁多的发式，尤其少见头顶梳高髻的现象。这应该是秦代与汉代人们发式的根本不同。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穿衣男木俑、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玉人等西汉早期文物上的人物发式就是上述的那种扁髻，可以证明这种发式是西汉流行的式样。此外，陕西阳陵陪葬俑的发式是将头发梳到后面，再从右侧将发束反梳上来，在头顶后部盘成一个平髻。但相比起来，梳扁髻的要更多一些。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軑侯夫人发髻实物，陕西西安、临潼等地出土的汉代女陶俑等告诉我们，不仅男子，就是女子也普遍梳理这种扁髻。区别就是女子的扁髻要大一些，多盘两圈。它梳理简单，朴实无华。很有意思的是：严紧整齐的编发盘成的发髻与严刑酷法的秦代社会正相符合，与此相同，松散的发髻与西汉初年崇尚黄老、简朴无为的社会风气也非常一致。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式



西汉陶俑发式

这种发式也许是来自战国时期楚国的习惯。西汉初期继承了很多楚地的风俗。著名的长沙楚墓帛画中，御龙的男子梳的是从脑后反转上去的高发髻，凤鸟下的女子梳的是下垂的扁髻，都看不出曾先梳成辫子的迹象。这些都与汉代的发髻形式颇为近似。



西汉壁画人物发式



东汉画像石人物发式

下垂的扁髻对于男子来说，可能不便于剧烈的体力活动，把它梳得高一些，末端别在头顶上，或者让扁髻贴在后脑上，就更方便一些。这也就成了东汉时期比较流行的式样。笔者在重庆巫山地区做考古发掘时，曾经仔细观察过这里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发式。有一些男乐俑的脑后就梳理着这样的发髻。看上去是没有结成辫子，只是将头发拢到一起，别在后脑。这样的发式在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陶俑中常可见到。其他如山东汶山县孙家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门吏、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砖谒见图、山东嘉祥武梁祠东汉画像石等图像上的大量人物，都可以从他们头上看到类似的发髻。当然，同时也有将发髻盘在头顶上的做法，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弋射图与收获图中，就有在头顶梳一个发髻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收获图中，既有头顶梳发髻的，也有不在头顶梳发髻的，



那么就应该是头顶梳圆髻与在脑后垂扁髻两种发式同时存在了。其他像在成都出土的东汉陶俑中也有头顶梳圆髻的农民形象，河南、山东等地的东汉画像石中也有一些头顶梳圆髻的人物出现，如河南南阳出土的狩猎图等。但这时的发髻，应该不经过先梳成辫子的那一道手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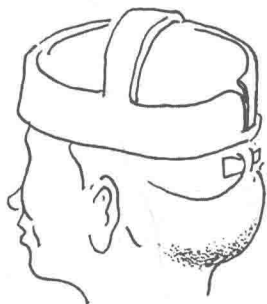
东汉石雕戴幘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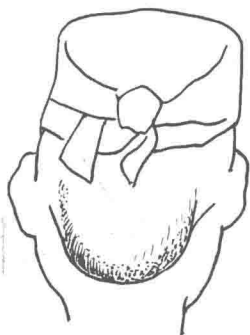
东汉女陶俑发式

这时，梳扁髻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发式仍可以明显地分辨开来。在徐州狮子山汉墓兵马俑中有个别骑俑的发式比较特殊。它是从头顶上中分，披散在头两旁。似乎还被剪短过。这种俑的面部扁宽，颧骨突出，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特征，可能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士兵的写照。后来嘉峪关地区的十六国时期墓葬壁画砖上，也可以见到披发、赤足的农人形象，可能也是在当地落户的原游牧民族。

在注意到这些梳扁髻的发式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与先秦人物形象有所不同的是，这些汉代人物形象，特别是梳扁髻的人物形象，大多同时戴有各式各样的头衣，如冠、巾幘、鬓、幘头、弁等等。如此丰富的头衣应该是造成人们不先梳辫子再挽成发髻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可以说是互动的因素。由于有了头衣压束头发，松散的头发拢成发髻后也不再容易松脱。而人们习惯简单地梳理扁髻后，又对头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汉代的头衣便随之产生明显的变化，并且影响以后的各个朝代。



巫山出土东汉戴幘陶俑



巫山出土东汉陶俑发式

西汉早期，由于开国皇帝刘邦与主要功臣都是楚人，继承了大量楚国的文化习俗，戴高冠就是其中之一。这时的冠，只是单独的装饰用品，没有遮风避土或防晒、束发等作用。但需要看到，古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戴冠的。在宗法等级礼仪制度的约束下，似乎冠是贵族以及社会中上层的专利。古代士以上阶层的男子才在二十岁时行冠礼，以后可以戴冠。汉代刘向的《说苑》中称：“君子成人必冠带以行事，弃幼少嬉戏惰慢之心，而衍衍于进德修业之志。”而一般社会下层的男子，即与君子对应的“小人”、“野人”之属，大概就没有戴冠的资格了。

《续汉志》载：“古者有冠无幘。”在西汉的玉雕、空心砖与壁画中出现的戴冠者都没有幘，他们的冠正是一种“幘持发”的用具。有冠无幘，也可能是戴冠者不幘，戴幘者无冠。西汉时人冠不加幘的做法，东汉人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例如东汉的沂南画像石上历史故事画中人物都戴无幘的冠，而表现当时人生活的祭祀、饮宴场面中的人物则戴有幘之冠。幘是什么呢？《急就篇》颜师古注：“幘者，韬发之巾，所以整乱发也。”看来它起先就是一块包头发的布帛。从冠到幘，是汉代头衣的一个重大演变。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种人们平时不大看重的头衣——颊。

《仪礼注疏》卷二：“缁布冠缺项青组，纓属于缺，缁纁广终幅，长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缁组纁纁边，同篋。”注云：“缁布冠，无笄者著。颊围发际，结项中，隅为四缀，以固冠也。项中有緋，亦由固颊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颊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茵，为颊属，犹著纁今之幘梁也。终，充也。纁一幅长六尺，足以韬发而结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组为纁，垂为饰。无笄



者纓而結其條。纓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上凡六物。隋方曰篋。”由此我们看到，对于冠来说，有没有簪笄是一个大的区别。有簪笄的，可以利用簪笄将冠固定在发髻上。而没有簪笄的，如缙布冠，就只能利用颊来固定了。所以说汉代的卷帻是从颊派生出来的了。《诗经·小雅》中有一首“颊弁”，据说是“刺幽王也”，可见颊的历史十分悠久。而从诗的含义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颊确实是用来包围头发，使冠固定住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孙机先生将颊解释成：“固冠的带子。它的形象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殷墟妇好墓中将一件出土玉人头上的卷筒状饰物解释成“颊”，就不大确切了。实际上，从文献记载来分析，颊应该是一个圆圈形状的发箍，套在头顶上，压住头发，左右两侧有纓系，可以在颌下打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上表现的带子，只能是一种简化了的颊。而殷墟妇好墓中那件出土玉人头上刻画出一圈束压头发的圆箍，可能近乎“颊”的原形。但是它下面没有系带，不知是不是工匠省略了还是当时的“颊”尚不完全。至于前面的卷筒状饰物，则应该是另外附加的头饰，大约近似于冠了。

颊在压束头发上具有独特的功能。古代人讲求礼教，对于外貌是很重视的，头发应该梳理得整齐干净，没有乱发露出。而“首如飞蓬”那样，就是内心十分忧伤，顾不到礼教的情况了。女子是利用大量簪钗来达到使头发整齐这一目的的。而男子，就是利用颊了。巾帻，作为“整乱发”的头衣，应该是继承了颊的作用。后来魏晋至明代间陆续兴起的笼冠、幘头、网巾、勒子等种种头衣，也或多或少地在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所以，很可能“帻”在流行后就代替了颊。

最早的帻，也是一件缠在头上的巾子，可能是用窄窄的长条，整齐地在头上缠成一圈，类似今天苗族的缠头。汉代时它被改进成一种帽子。原来无屋的帻只有一个圆圈，有屋的帻则在圆圈的上面加一个可以盖住头顶的高顶，有点像近代人戴的无檐制帽。从汉代文物图像中可以看到，这时的帻变成一条整齐的宽沿，在脑后断开，形成两个向上翘的尖端。

除帻以外，在东汉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类似今天人们戴的帽子那样的头衣，如“巾”、“帽絮”等。这些头衣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们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释名·释首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蔡邕《独断》云：“帻者，古者卑